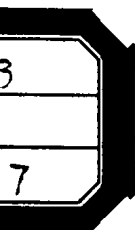




列宁論民族殖民地 問題的三篇文章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論民族殖民地 問題的三篇文章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中共中央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本书譯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和第31卷，这次排印时，由譯者根据原文重新作了一次校訂。

列宁論民族殖民地問題的三篇文章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
中共中央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編輯局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 字数 22,000

1966年1月北京第1版

196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 1001·685 定价 0.12元

目 录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綱）	1
1. 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1
2. 社会主义革命和爭取民主的斗争	2
3. 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对联邦制的关系	4
4. 无产阶级对民族自决問題的革命提法	5
5. 民族問題中的馬克思主义和蒲魯东主义	6
6. 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8
7. 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9
8. 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10
9. 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对 自决的态度	11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	15
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	22
注释	28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提綱)

1. 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資本发展到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使垄断代替了竞争，創造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所以，在西欧和美国，現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剥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无论在經濟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在經濟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軍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須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沒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骗人的鬼話——的基础上同它們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当然，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必然会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这只有在最終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

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

2. 社会主义革命和爭取民主的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靠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像不实行完全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准备好战胜资产阶级。

如果从民主纲领中删去一条，比方说，删去民族自决这一条，借口这一条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不能实现”，或者说是一种“梦想”，那同样是错误的。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论断，可以从绝对的经济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从相对的政治意义上来理解。

在第一种场合，这个论断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劳动货币或危机的消灭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不能实现的，如果认为民族自决也不能实现，那是完全不对的。第二、即使只举 1905 年挪威和瑞典分离的例子，就足以驳倒认为民族自决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实现”的论断。第三、如果德国和英国在今天或明天改变一下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相互关系，则波兰、印度等新国家的形成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第四、金融资本竭力向外扩张，“自由”收买和贿赂最自由的民主共和国的政府以及任何一国、甚至“独立”国的被选出来的官吏。金

融資本的統治，也和一般資本的統治一樣，並不是政治民主方面的任何改革所能消滅的；而民族自決則完全是屬於政治民主方面的。但是金融資本的這種統治，絲毫不能消除政治民主這一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的更自由、更廣泛和更顯明的形式的作用。因此，從經濟意義上來說，關於政治民主的一種要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實現”的一切論斷，歸結起來，就是在理論上對資本主義同一般政治民主的一般的、基本的關係作了不正確的斷定。

在第二種場合，這種論斷是不全面和不確切的。因為不單是民族自決權，就是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在帝國主義時代也只是不完全地、殘缺地而且是以罕見的例外形式（如1905年挪威和瑞典的分離）“實現”的。一切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立即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經過多次革命也是“不能實現”的。然而，社會民主黨並不因此而拒絕為實現這一切要求立即進行最堅決的鬥爭，因為拒絕這種鬥爭只有利於資產階級和反動勢力；恰恰相反，必須革命地而不是改良地提出並且實現這一切要求；不要局限於資產階級合法的範圍，而要打破這個範圍；不要滿足於議會中的發言和口頭上的抗議，而要使群眾積極地行動起來，擴大和加劇爭取實現任何根本的民主要求的鬥爭，直到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直接進行衝擊，也就是說，直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剝奪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不但可以因大罷工、遊行示威、飢民騷亂、軍隊起義或殖民地暴動而爆發，並且也可以因德雷福斯案件¹和薩比林事件²之類的任何政治危機，或者因在被壓迫民族的分離問題上舉行的全民投票等等而爆發。

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壓迫的加劇並不會使社會民主黨放棄為爭取民族分離自由而進行的“空想的”（像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鬥爭，相反地，會使社會民主黨加緊利用就在這種基礎上發生的沖

突，作为群众行动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3. 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对联邦制的关系

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他甚至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³。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一定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一定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⁴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暧昧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确地规定政纲，并且在政纲中特别估计到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虚伪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

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們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4. 无产階級对民族自决問題的革命提法

不仅民族自决这个要求，就是我們最低民主綱領中的一切条文，早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就已經由小資产階級提出来了。而且小資产階級到現在还是空想地提出这一切条文，因為他們看不見民主制度下的階級斗争和这种斗争的加强，而相信“和平的”資本主义。那种欺騙人民的并且为考茨基分子所拥护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空想就是这样的。同这种市儈的机会主义的空想相反，社会民主党党綱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現象：民族已經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压迫民族的无产階級不能只用籠統的、千篇一律的、为一切和平主义的資产者所重复的空談去反对兼并和贊成一般民族平等。对帝国主义資产階級感到特別“不愉快的”問題，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的疆界問題，无产階級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階級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該国疆界以內，这也就是說，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階級应当要求受“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无产階級的國際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話，要想在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間达到相互信任或階級团结是不可能的；那些改良派和考茨基派的民族自决的拥护者的假面具就仍然不能被揭穿，他們是閉口不談被“他們本”民族压迫并被强制地留在“他們本”国内的民族的。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必須特別坚持和实现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无条件的（包括組織

上的)團結。否則在資產階級各種詭計、背叛和欺騙下，就不能捍衛住無產階級的獨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因為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經常把民族解放的口號變成欺騙工人的手段：在對內政策上，它利用這些口號去同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實行反動的妥協（如在奧地利和俄國的波蘭人同反動勢力勾結起來，壓迫猶太人和烏克蘭人）；在對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競爭的帝國主義強國之一相勾結，來實現自己的掠奪目的（如巴爾干小國的政策等等）。

爭取民族自由、反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鬥爭，在某種情況下可能被另一“大”國利用來達到它的同樣的帝國主義的目的，這種情況也很少能使社會民主黨拒絕承認民族自決權，正像資產階級屢次利用共和主義口號來達到政治欺騙和金融掠奪的目的（如羅曼語各國），並不能使社會民主黨人拒絕自己的共和主義一樣^①。

5. 民族問題中的馬克思主義和蒲魯東主義

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相反，馬克思認為一切民主要求，毫無例外，都不是絕對的東西，而是資產階級領導的群眾反對封建制度的歷史表現。這些要求中的每一個要求都能成為並且在某種情況下已經成了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的工具。在這方面，把政治民主

① 不用說，如果認為從民族自決權中似乎會得出“保衛祖國”的結論，因而否認民族自決權，那是很可笑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在1914—1916年常常拿民主派的任何一個要求（如它的共和主義）和反對民族壓迫的主張，為“保衛祖國”辯護，這也是不值一駁的。馬克思主義承認歐洲某些戰爭中，例如，法國大革命或加里波第戰爭中，保衛祖國的結論，而否定1914—1916年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衛祖國的結論，都是從分析每次戰爭的具體歷史特點，而決不是從什麼“一般原則”和綱領中某一條文得出來的。

要求之一，即民族自决拿来同其余的要求相对立，这在理論上是根本不对的。在实际行动中，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的爭取一切民主要求（包括建立共和国的要求）的斗争服从自己的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

另一方面，同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认”民族问题的蒲鲁东分子相反，马克思鉴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大于一切，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⁵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正是从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利益出发，马克思在1848年要求德国民主派一胜利就宣布和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民族的自由⁶。正是从英国工人的革命斗争着想，马克思在1869年要求爱尔兰同英国分离，他并且补充说：“即使分离以后建立联邦也好”⁷。马克思只是由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才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英国工人。只有这样，他才能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革命方法来抵制机会主义者，抵制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还没有实现爱尔兰的“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只有这样，马克思才能驳斥资本辩护人的论调，他们大叫什么小民族的分离自由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不但经济集中而且政治集中都是进步的；而马克思却不是以帝国主义者的理解来坚持这种集中的进步性的，他坚持各民族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在各国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基础上的接近。只有这样，马克思才能也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拿群众的革命行动来抵制那种口头承认而且往往是假装承认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态度。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由它所揭露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伪善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①，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这种政策的正确性，这

① 希腊神话中说，奥吉亚斯的牛圈三十年来没有打扫，后来被海格力斯在一日内扫清。意思是指极肮脏、极污臭的地方。——译者注

种政策应当成为各先进国家的榜样，因为现在每个先进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①。

6. 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

在这方面，应当分成三类主要国家：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运动在这里早已结束。这些“大”民族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这些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正像十九世纪英国无产阶级对爱尔兰的任务一样^②。

第二、欧洲东部的国家：奥地利，巴尔干国家，尤其是俄国。这里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才特别发展了起来，民族斗争才特别尖锐了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

① 有些人常常借口马克思对某些民族（如 1848 年的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来否认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承认民族自决的必要性，例如，最近德国的沙文主义者连奇在“钟声”杂志（《Die Glocke》）8 第 8、9 两期上就是这样的。但这是不对的，因为 1848 年无论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⁹。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 1848 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

② 在某些没有参加 1914—1916 年战争的小国中，如荷兰和瑞士，资产阶级竭力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为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辩护。这就是促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否认自决的原因之一。人们用不正确的理由来拥护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否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结果在理论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中表现了一种小民族的狭隘性，忘记了被“大国”民族奴役的各民族的亿万居民。果特同志在他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不正确地否认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他正确地运用了原则，因为他要求荷属印度立即实行“政治的和民族的独立”，并且揭露了拒绝提出这个要求和为这个要求而斗争的荷兰机会主义者。

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这里特别困难和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融合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切殖民地，总共达 10 亿人口。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一部分刚刚开始，一部分远未结束。社会主义者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社会主义者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而有机会的时候，也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7. 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帝国主义时代和 1914—1916 年的战争，特别提出了在各先进国家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任务。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也就是说，在那些把“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应用于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以此粉饰这场战争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中间，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有两种主要色彩。

一方面，我们看到，相当露骨的资产阶级奴僕借口帝国主义和政治集中的进步性而赞成兼并，否认似乎是空想的、梦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等等自决权。属于这类人的，在德国有庫諾夫、帕尔烏斯和极端机会主义者；在英国有一部分費边社分子和工联领袖；在俄国有机会主义者謝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凱維奇等。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考茨基分子，其中也包括王德威尔得、列諾得尔及英法等国的许多和平主义者，他们主张同前一类人讲统一，而在实践上和他們完全一致，他们拥护自决权纯粹是口头上的

和虛假的，因為他們認為要求政治分離自由是“過分的”（“zu viel verlangt”，見 Kautsky 在 1915 年 5 月 21 日《Neue Zeit》^① 上所用的字眼），他們不堅持正是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採取革命的策略；相反地，卻抹殺他們的革命義務，為他們的机会主義辯護，使他們易于欺騙人民，對於把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強制地留在本國版圖內的國家的疆界問題恰恰避而不談，等等。

這兩類人同樣都是机会主義者，他們出賣了馬克思主義，喪失了理解馬克思用愛爾蘭的例子說明的那種策略的理論上的意義和實踐上的迫切性的任何能力。

至於其中讲到兼併，這個問題由於戰爭而變得特別迫切了。但是，什麼是兼併呢？不難相信，反對兼併的抗議，或者歸結於承認民族自決，或者是基於主張維持 status quo（現狀）和敵視一切暴力、甚至革命暴力的和平主義的言詞。這種言詞根本是虛偽的，同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

8. 無產階級在最近將來的具體任務

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將來爆發。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所面臨的刻不容緩的任務，就是奪取政權、剝奪銀行和實行其他專政措施。資產階級，特別是費邊社分子和考茨基分子類型的知識分子，在這種時機一定會千方百計地打亂和阻止革命，硬要革命接受有限的民主目的。如果說，在無產者開始沖擊資產階級政權基礎的情況下，一切純民主要求在某種意義上都會起着阻礙革命的作用，那末，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宣布和實現一切被壓迫民族

① 考茨基在“新時代”上。——編者注

的自由(也就是它們的自決權)是非常迫切需要的,正如 1848 年德国的或 1905 年俄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为获得胜利而迫切需要它一样。

然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許还要經過五年、十年或者更多的時間。今后提到日程上来的是要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无法留在工人政党内,使他們不能取得 1914—1916 年那样的胜利。社会主义者应当向群众說明:如果英国社会主义者不要求各殖民地和爱尔兰有分离的自由;德国社会主义者不要求殖民地、亚尔薩斯人、丹麦人和波兰人有分离的自由,不把直接革命宣传和革命群众行动也推广到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方面去,不利用薩比林这样的事件来在压迫民族的无产階級中間进行最广泛的秘密宣传,来举行游行示威和組織革命群众发动;俄国社会主义者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如此等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沙文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沾滿了血污的帝国主义君主派和帝国主义資產階級的走狗的行动。

9. 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 以及第二国际对自決的态度

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自決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早在 1903 年的代表大会上就表現出来了。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綱,并且不顾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抗議把承认民族自決权的第 9 条列入了这个党綱。此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以党的名义重新提議把第 9 条从我們党綱中刪掉,或提議用其他某种說法来代替这一条。

在俄国，被压迫民族的人口达一亿以上，至少占全国人口的57%，这些民族多半住在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民族的文化程度比大俄罗斯人高。在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具有特别野蛮的中世纪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绝对必须承认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同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1912年1月重新恢复的我们的党，在191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¹⁰，这项决议肯定了自决权，并且正是根据上述具体意义作了说明。1914—1916年，不论在资产阶级或机会主义社会主义者（鲁巴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和“我们的事业”杂志等等）中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都曾猖獗一时，这就更加促使我们坚持这个要求，并且认为否认这个要求的人实际上是在支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沙皇政府。我们党声明，它对这种反对自决权的言行决不负任何责任。

波兰社会民主党对民族问题立场的最新说法（波兰社会民主党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的宣言）包含下列一些思想：

这个宣言痛斥德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把“波兰地区”看作将要到来的赔偿赌博中的抵押品，“使波兰人民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波兰社会民主党坚决严正地提出抗议，反对把完整的国家重新分成几部分”……宣言斥责那些让霍亨索伦王朝担当……“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事业”的社会主义者。它深信只有参加这一即将到来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打碎民族压迫的枷锁和消灭异国统治的一切形式，保证波兰人民能够在各民族的联盟中作为平等的一员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宣言认为战争“对波兰人”是“双重的自相残杀的战争”（1915年9月27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2号第15页；俄译文见“国际和战争”文集第97页）。

这些論点实质上同承认民族自决权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它的政治措詞比第二国际大多数的綱領和決議更含糊不清。用确切的政治措詞来表达这些思想和确定它們适用于資本主义制度还是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嘗試，都将更清楚地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否认民族自决是錯誤的。

1896年国际社会党人伦敦代表大会承认民族自决的決議，应当根据上述論点作一些补充，指出：（1）这一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別迫切；（2）一切政治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这一要求）都有政治条件和階級內容；（3）必須分清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具体任务；（4）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承认自决是不彻底的，純粹是口头上的，因此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虛伪的；（5）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大国民族（大俄罗斯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等）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坚持受“他們”民族压迫的那些殖民地和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和沙文主义者一致的；（6）必須使为爭取这一要求和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于推翻資产階級政府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的群众革命斗争。

把某些小民族的观点，尤其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他們反对波兰資产階級用民族主义的口号去欺騙人民，結果使他們錯誤地否认自决）的观点搬到“国际”上来，是一个理論上的錯誤，是用蒲魯东主义代替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不自觉地支持大国民族的最危險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

附言：在刚刚出版的1916年3月3日的“新时代”上，考茨基公开向最卑鄙醜陋的德国沙文主义的代表奥斯特利茨伸出基督